
從政策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新時代 學校經營的新議題

劉世閔/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哪一種價值才是學校經營的目標？在知識經濟時代，首先開宗明義提出這項議題，不可否認地，校長是經營學校知識與價值的重要守門人（gatekeeper）之一，在知識經濟時代，除科學典範與經濟產業的追逐外，還有哪些是我們不經意忽略的空白課程？哪些作為才有助學校效能的提升？

貳、本論

本文針對知識經濟時代學校經營目標、行政組織、課程及學習上，分別探討在人力與人性培育的權衡、校園組織再造、教育改革的課程修正路線及數位學習與數位落差等議題提出淺見，冀望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人力與人性培育的權衡？

知識經濟時代學校經營在人力與人性培育的權衡？1996年「世界經濟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知識經濟」概念，人力資本與技術知識即經濟發展的核心，管理學大師彼得·杜魯克（P. Drucker）更指出就是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根本經濟資

源（傅振焜，1994）。於是，產業與組織結構轉型，無形資產的知識經濟，使知識 Know-how之產生、傳播、應用與開拓成為決定一國經濟成長與競爭優勢的關鍵。

在基因科技與資訊科技跳躍發展的B世代（bio era）及E世代，讓資本家更具勢力，人類初嚐成為造物主的滋味，資訊改變人類日常的行為與習慣，學校則成為知識經濟的發源地，知識則逐漸變成資本。不過，Seth Shulman則指出接近尾聲的二十世紀免費分享的知識變成一種帶有危險的物種。當意見、概念、藍圖與編碼在新興的知識經濟體中變成最熱門的商品，人們也開始用前所未見的方式來囤積、爭奪與控制這些財貨（吳書榆（譯），2001）。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專利是否會宰制知識分享的空間？

台灣目前的社會是否是一個「缺德」的時代？當今社會亂象是否意味這是一個民免無恥、道德淪喪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除了開發人力（human power），是否也應重視啟蒙人性（humanity）？針對國內近年教育改革情況，孫效智（民89）指陳學校教育過份重視理工實用，卻輕忽了人文理想的教育體制，讓我們的社會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九年一貫課程將學生學習內容之結構，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



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統整原本國小11科(國語、數學、自然、社會、音樂、體育、美勞、道德與健康、團體活動、輔導活動和鄉土教學活動等科目)及國民中學21科(國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認識台灣、公民與道德、生物、理化、地球科學、健康教育、家政與生活科技、電腦、體育、音樂、美術、童軍教育、鄉土藝術活動、輔導活動、團體活動和選修科目等科)之單科型式。原本道德與倫理的科目,強調處理人們關係所應遵循的準則與規範,在現行的課程架構下,逐漸消失其獨立單科的地位,因此,學校課程如何兼顧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已成為新世紀的新挑戰議題。

二、校園組織再造,造什麼?

根據目前正在中小學實驗階段的國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使校園刮起一股組織再造風,再造的重點包括 總員額量管制、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的進用及勞務外包等三項重要指標。在三項指標下象徵某種層度的權力重組?校園生態會如何重組才能迎合新世紀的新挑戰?現行國中小學校編制是否合理需要調整?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轉變與教育人員負擔,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需要修正?如何修正?為減輕教師負擔,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應如何設置?其權責如何界定(對象、工作範圍、審查標準、認證程序、聘任程序、待遇、權責、不適任者之解聘)?現行國中小學

處、室及人力編制應否改變,如何調整(鬆綁)?教師的授課時數是否合理,如何修正?將來學校編制若採總員額量管制,其標準該如何界定?學校行政事務若採勞務外包方式是否可行,如何規範?校園結構改變之後,如何重建新的校園文化?

管理大師彼德·聖吉的「第五項修練」提到「學習型組織」的改革觀念,強調學習的速率將決定能否在未來的世界中存活(林振春,1999)。O'Connor, Bronner, & Delaney (1996)等人也認為在學習型的組織中,成功的獎勵是高的,而失敗的風險是低的,如此鼓舞成員去嘗試新鮮事。學習是企業永續經營的生存之道,然而,學習速率與賞罰原則適用於強調營利與競爭的企業環境,是否也同樣適用於學校?

聖吉認為組織有七項學習障礙,分別是:(1)本位主義;(2)歸眾於外;(3)負責的幻想;(4)缺乏創意;(5)煮蛙效應;(6)從經驗中學習的錯覺;(7)管理團隊的迷思。這些障礙讓學習型組織逐漸僵化而滅亡,因此,他提出學習型組織至少應該有五項基本修練:第一項修練指的是系統思考。第二項修練則是自我超越。第三項修練為改善心智模式。第四項修練乃是建立共同願景。第五項修練即團隊學習(林天祐,2003)。

強調團隊學習的聖吉,與另一位以大象與跳蚤為隱喻,來說明組織與個體的關係的 Charles Handy,在觀念上並非全然相同,那麼,學校經營應重視大象還是跳蚤,抑或兩者兼顧?目前經常被學術界引用的學校本

位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t) 模式，是否是未來學校經營的萬靈丹、還是潘朵拉盒 (Pandora's box)？隨著經費與人事權逐漸下放到學校，學校成為作決定的主體，美、澳等國少數主張這種理論在台灣能否全然移植？該理論強化學校在人事聘用、課程、經費等方面應該是學校自主，然而夾雜著關說、請託的風氣產生的弊端，校間差距隨著城鄉政策的改變而逐漸拉大之際，即若校長從行政領導改變為課程領導，「酒香不怕巷深」的模式也逐漸轉變成公共關係取向，校園倫理從「上司--部屬」調整為夥伴經營關係，這些措施是否象徵新學校文化較有效能？

三、課程修正路線如何修？

台灣自1994年倡議教育改革以來，變遷中的國家認同的議題也成為課程路線改變爭議之所在，鄉土語言透過本土化以「被救贖」姿態 (卯靜儒，2002) 到成為正式課程之一，如此，課程本土化後，學校的利/立基在哪裡？有人認為我們該開始思索本土研究應否全球化的議題？還是更應保存本土知識資源？有人質疑學校課程本土化能/應否去中化而與全球化接軌？台灣如何面對經濟中國化、政治與課程逐漸去中化的情境？更有人質疑台灣課程是全球化還是美國化？學校新文化該何去何從？

根據Robertson的說法，全球化意指世界的壓縮及增強世界整體意識的概念。世界在此全球化的加速歷程中，具有文化和反思的

基本特性，且遵循一不可改變的邏輯，而成為一完整的體系 (張珍璋，2002)。也有人認為全球化乃是一種由資訊與傳播科技和資本主義推動的世界壓縮，亦即是一種時間、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壓縮、連結與互相依賴，而此種壓縮導致政治、經濟、文化、知識與研究等面向中的現象逐漸呈現跨國的趨向；而本土化則是本土民族對外來不相容文化的回應，或是對盲目套用西方文化的反省，並轉而積極發揚本土的特質或從本土知識根基上建構理論與概念 (洪雯柔，2002)。因此，反全球化也成為另類的全球化，面臨歐美文化霸權，台灣的文化輸入始終大於文化輸出，使學校課程明顯產生本土與全球不對稱失衡現象。顯然地，新學校經營如何立基於本土、放眼全球，在兩岸競合遊戲中扮演權衡角色，成為當今教育重要議題。

四、數位學習與數位落差

數位時代的來臨，學生學習方式也逐漸成為「com or out」的零和遊戲，設若學校組織如同比爾·蓋之所言的「數位神經系統」，那麼這種創新的系統已開始顛覆傳統學習、教師在職教育與親師溝通等方式，互動學習與資訊交互作用的機會，隨著數位資訊的發展，知識擴增進入一項超越幾何級數發展倍速增生時代。

e-learning的學習方式的確具無遠弗屆、穿越古今及即時互動等特性，然而，如此學習方式所產生的問題，並非學習方式的錯誤，而是學習機會的不均。「數位落差」的

概念的興起，始於199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論辨應否透過1996年電訊傳播法案管制資訊基礎建設中出現的新興市場力量而提出的。這項概念意指擁有使用資訊科技能力者及未具備者間的差異，未具備上述能力者也產生資訊取得不易、教育與工作機會減少、及收入偏低等現象。根據分析，促使數位學習落差的原因不外是：地理與文化環境不利、人口老化、教育水準不平均、個人及家庭的經濟因素、父母或監護人的教育程度、資訊素養、興趣、動機的欠缺、與資訊科技不足等。於是，隨著網路服務越增加，個體接受資訊的強弱、實體取用迥異、及個體資訊素養的差距，造成數位落差問題越嚴重，擴大了既有的國際、城鄉、貧富與族群間的不平等。

為了消弭數位落差，2000年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與前副總統高爾提出一項高達二十多億美元總預算「轉數位落差為數位機會 (From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Opportunity)」計畫。在台灣方面，行政院於1982年成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開始資訊教育，並選定12所高中進行電子計算機教學實驗，開啟中等教育實施電腦教育之開端。1997年，因教育部電算中心推動台灣學術網路 (TANet) 到中小學，希望23個縣市政府教育局逐年成立教育網路中心，維持中小學網路暢通，以推動網路普及化，中小學才開啟世界之窗，台灣國中小學教育才真正與國際接軌 (陳香吟，2002)。為了增進全民的資訊素質，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資

策會推動「一年e縣」聯合活動，及近日行政院的「數位台灣」更是將台灣推向數位國家的重要一步。

然而，資訊接受機會的不均等，數位學習使人類知識的累積加速，直接或間接地擴大了社會的不正義，在知識經濟資本主義的催生下，加劇貧富階級在社經地位的落差，資訊功能性文盲 (functional illiteracy) 增生，他們不具有在現代社會中所必需的資訊知識與素養，導致無法適當扮演社會角色，製造更多資訊新貧階級，這些現象也是未來學校新經營所面臨的新一波挑戰。

參、代結語與省思

新的資訊、基因與奈米時代，已經引發新一波的校園革命，學校經營者如何權衡人力與人性的培育，校園組織再造如何兼顧行政的效率與效能，教育改革的課程修正路線如何立足本土、放眼國際，及在數位時代如何永續數位學習與平衡數位落差等議題，都顯現學校經營者所面臨的新議題與新挑戰，在一片求新、求速的新時代中，正義、公平、自由與績效間，是否有哪些價值是我們無意失落的？



附註

本文修正自劉世閔(2003)。新時代學校經營的新議題：從政策社會學的角度分析。2003.12.3發表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新世紀學校經營研討會」(pp.34-39),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參考資料

- 卯靜儒。(2002)。認同政治與課程改革：以鄉土課程為例的課程社會學分析。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2(2)1-27。
- 吳書榆(譯)(2001)。知識的戰爭(S. Shulman著)。台北：聯經。
- 林天祐(2003)。教育行政學。台北：心理出版社。
- 林振春(1999)。學習的速率決定你我的存活。社教雙月刊, 94, 35-38。
- 洪雯柔(2002)。全球化、本土化辯證關係中的比較教育研究。比較教育, 53, 80-90。
- 張珍瑋(2002)。全球化對台灣、中國大陸及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之影響。載自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 新世紀的教育遠景(pp.71~120)。台北：學富。
- 陳香吟(2002)。數位落差 - 資訊教育行政與實務問題。教育研究月刊, 99, 15-27。
- 陳襲懿(2000)。建構全民行動學習資訊網。竹縣文教, 22, 43-51。
- 傅振焜(1994)。後資本主義社會。台北：時報。
- O'Connor, B. N., Bronner, M., & Delaney, D. (1996). South-western training for organizations. Cincinnati, OH: South-western Educational Publishing.